

化解隐性债务再提速 城投提前兑付释风险

本报记者 石健 北京报道

随着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工作持续推进,各层级城投公司也在通过一系列“组合拳”释放债务风险。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全国城投债本

利于化解隐债

融资方选择提前结束成本较高的城投债的信托项目,转而由券商来接手,这样就实现了低成本置换高成本。

从区域分布看,江苏、湖南提前兑付规模居前两位,均超过100亿元。从主体级别看,提前兑付主体仍以AA级为主,占比60.08%。从行政级别看,区县级城投提前兑付的规模占比最大,为56.2%,同比增加4个百分点。对此,中诚信国际认为,从后续情况看,随着各地“5年至10年化债计划”不断推进,特别是部分地区开启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工作后,地方政府或加快速度置换存量隐性债务,部分资金投向城投公司回款,提前偿还城投债的可能性将持续存在。

采访中,一位城投公司从事发债业务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发债主体提前兑付主要有四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募投项目存在变化,发债主体可能不需要这笔发债资金,所以提前结束发债业务。

在该负责人看来,第二种更值得关注。“第二种可能是目前市场比较常见的。Wind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城投债发行规模2.17万亿元,相比上年同期下降7.3%;净融资规模为755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5月城投债发行规模为2377亿元,环比下降54%;净融资规模为141亿元,环比下降90%。而与此同时,近期市场出现了‘资产荒’,有更多的

金融提前兑付规模共计1028.13亿元,同比上升132.82%,规模大幅上升的原因或为部分地区在化解隐性债务过程中对部分城投债进行了优先偿付。据了解,此前多地已发文要求清理高成本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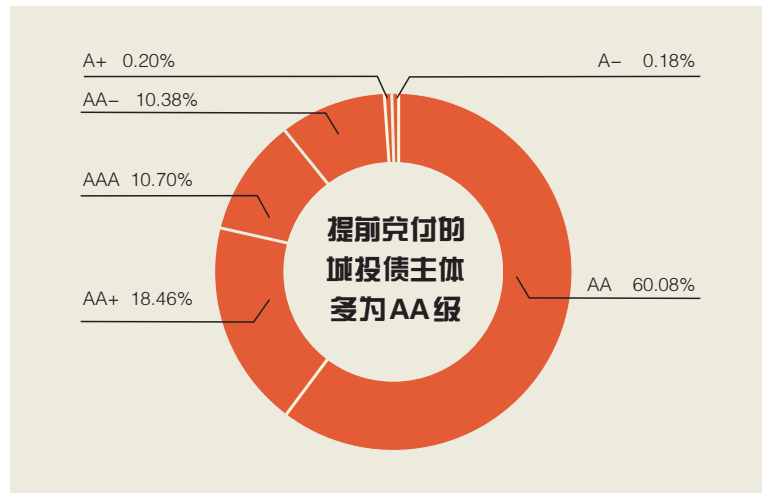
有业内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

者表示,“随着隐性债务置换速度加快以及城投融资需求增强,部分省份的城投公司提前兑付意愿加大,提前兑付规模也在增大。尤其对于弱资质的城投公司来说,在持有人

者表示,“随着隐性债务置换速度加快以及城投融资需求增强,部分省份的城投公司提前兑付意愿加大,提前兑付规模也在增大。尤其对于弱资质的城投公司来说,在持有人

者表示,“随着隐性债务置换速度加快以及城投融资需求增强,部分省份的城投公司提前兑付意愿加大,提前兑付规模也在增大。尤其对于弱资质的城投公司来说,在持有人

者表示,“随着隐性债务置换速度加快以及城投融资需求增强,部分省份的城投公司提前兑付意愿加大,提前兑付规模也在增大。尤其对于弱资质的城投公司来说,在持有人



数据来源:Wind

付的量始终没有达到一定规模。”

2017年末,随着债券市场的下跌,城投债溢价明显减少,城投债提前兑付高峰也随之到来。根据国盛证券统计,仅2018年,就有310只城投债完成了提前兑付操作。2018年8月开始,大部分被纳入置换范围的城投债完成了提前兑付,之后的提前兑付数量大幅减少。2014年底认定的14.34万亿元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基本完成置换。

而随着监管政策收紧,城投提前兑付迎来了第二高峰。记者梳理2020年年末的发债信息看到,从2020年12月开始,多笔发债用途进行了改变,与以往用于偿还债券本金并标注偿还哪一只地方政府债券不同的是,再融资债券用途只表述为“用于偿还存量债务”。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时虽然没有官方文件说明为什么这样操作,但是很多地方已经着手建立地方隐性债务化解试点,再融资债券大概

会议通过提前兑付议案之后,一般会按照债券面值进行兑付,因此,部分估值收益率低于面值的债券有望在短期获得不错的收益,有利于部分城投公司的风险缓释。”

率会用作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而另据广发固收统计,仅2020年12月,共有22只再融资地方债,规模合计949亿元,这些债券的用途表述出现变化,由“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变化成“偿还政府存量债务”。而后2021年1月至3月,“偿还政府存量债务”的再融资债合计发行4634亿元。分月度来看,2021年1月发行3623亿元,2月发行557亿元,3月发行453亿元。

再融资债券用途改变的同时,自2020年12月开始,多笔债券开始进行提前兑付。江苏某县区级城投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其实,提前兑付的主要为县区一级的城投公司,本来其经营压力就加大,但是随着窗口指导意见明确一些尾部地区将被化为‘红色区域’,再融资能力将受到影响,所以,很多城投公司只能通过提前兑付的方式来抬升自身的信用等级。而其资金则或来自再融资债券。”

尾部城投迎利好

从近期监管释放的信号来看,城投加速提前兑付也是在契合监管要求。

记者梳理发现,2021年,城投融资收紧,部分地区城投公司融资困难、偿债压力加大,面临一定偿债压力。为维护地区信用环境、保障平台债务兑付,推动平台整合升级、设立信用保障基金成为高风险地区地方政府“化债”的重要措施。据不完全统计,兰州、潍坊、盐城、天津、青岛等城市发布了“化债”措施。

记者注意到,2020年12月,多地公告召开持有人会议提前兑付债券,提前兑付的债券以2017年后发行的企业债为主。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上一次提前兑付的城投债很值得关注,可以看出,提前兑付城投债的发行人信用水平较差,以低评级为主。从发行人的主体评级和隐含评级来看,近期提前兑付的城投债均为AA级及以下,中债隐含评级均为AA-,大都为区县及开发区级,整体利率水平较高。同时,多地区存在财力较弱、债务负担比较重的情况,后续可以多关注相关地区的提前兑付情况。但是,对于主动作为的地区来说,尤其是对于尾部地区的城投来说,是在于利好的。”

对于为什么会存在利好因素,一位从事城投债券业务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从城投发债实行分档制可以看出,监管既要限制部分弱资质地区城投新发债,又要保证不因防范风险而催生新的风险。因此,存量债务只能通过债务置换以及国开债贷款来化解。这种债务置换一般均会伴随

债券的大量提前兑付,从今年的规模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对弱资质城投来说,由于弱资质城投持有人会议通过提前兑付议案后,债券一般会按照面值进行兑付,因此部分估值收益率低于面值的债券有望在短期获得不错的收益,有利于尾部城投风险缓释。”

此外,亦有业内人士认为,从近期监管释放的信号来看,城投加速提前兑付也是在契合监管要求。一方面今年7月,有13家城投公司发生级别展望调整,其中7家涉及主体级别调整,7家涉及债项级别调整,3家涉及评级展望调整。有199个城投主体的债券出现异常交易,规模365.25亿元;区县级、AA级主体规模占比分别超45%、60%,其中,东部沿海某省份异常交易规模占比超21%。另一方面是监管化解隐性债务的态势不减,7月29日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发布《关于融资平台公司违法违规融资新增地方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通报》,披露了8起案例。

而从投资角度看,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报认为,下半年城投债到期及回售总额或超2.23万亿元,月均超3700亿元。在稳基建需求较强、保障城投合理融资需求等政策逐步落地背景下,预计城投债发行量将小幅增加,但净融资或延续收缩。未来,需重点关注政策边际调整或加剧城投再融资区域分化、区县级城投信用资质变化以及偿债高峰下尾部城投风险加速暴露的可能性。

低碳转型初启 消费金融探路“绿色”

本报记者 郑瑜 北京报道

越来越多的消费金融公司在金融服务中融入ESG发展理念,完善绿色消费金融综合服务体系。

近期,中信消费金融发布了消费金融行业的第三份ESG报告(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从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等多层面,披露

从线上化与数据化为“绿色”打开切口

尽管基础数据等碳基础设施建设仍在等待规模化落地,但是政策层面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搭建工作早已启动。

6月,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对碳中和背景下银行保险机构发展绿色金融支持提出更为全面与具体的要求。此外,在去年6月,人民银行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明确将绿色金融评价结果纳入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评级政策和审慎管理工具。绿色金融行业标准的逐步健全,也进一步促进了消费金融工作作为普惠金融主体,寻找适合自己的低碳转型之路,与加快推进“绿色化”切口的步伐。

多家消费金融公司已在绿色信贷上率先进行了低碳实践。2021年,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兴业消费金融”)发布了《2021—

了中信消费金融包括绿色金融在内的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

多位行业人士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消费金融公司ESG报告的发布,是在绿色消费概念兴起过程中,消费金融公司积极将自身业务与低碳转型目标深度融合的体现,同时也是金融行业积

2023年绿色消费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兴业消费金融方面对记者表示,公司将以纯信用、无担保的家庭消费贷为重点产品,通过理念宣导、产品设计、优惠措施等手段,引导客户将消费信贷用于购置节能环保、清洁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探索可持续消费金融的发展路径。

记者从马上消费金融(以下简称“马上消费”)处获悉,当前,在利用科技赋能节能减排方面,该公司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技术,在客户服务方面累计减少碳排放量1182.70吨,在贷前、贷中、贷后各个环节中实现零纸张服务,累计减少碳排放量达52.73万吨。此外,其还通过金融云平台,节省服务器与减少碳排放量。

中信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

域拥抱绿色金融的表现。但是,距离金融服务真正走向“绿色”,消费端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例如,当下个人碳账户尚未成体系,成系统,加之实务层面存在信息披露标准及评价体系尚未统一规范等问题,绿色概念火热之下,如何真正践行绿色发展道路,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区块链等技术,打破地理区域限制的前提下,中信消费金融通过拓展全线上化服务,推进无纸化操作,构建以数据和数字技术驱动的绿色低碳轻资产模式。

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信消费金融累计为830万人提供全线上无纸化服务,2021年全年使用电子签章及电子合同2000余万份。

马上消费金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在绿色发展模式方面,根据与碳排放相关的人力消耗、能源消耗、纸张消耗、金融云服务器消耗等环节,测算碳排放指标,并利用技术能力解决消耗。马上消费已通过自主研发金融服务“四化”,即流程数字化、业务数据化、场景智能化、基础设施云化,全流程的数字化经营使金融服务全环节不同程度降碳。“截至2021年6月末,已累计实现绿色消费交易额12.06亿元,促进绿色消费37.44万笔。”

消费金融仍处早期探索阶段

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线上化仅是绿色信贷的一小步尝试,在数据化背后带来的想象空间或许才是重点。

冰鉴科技市场总监周扬表示,对现阶段而言,从企业端推进绿色金融更为切实,消费端的绿色金融在当下仍是“浮于表面”,“具体来看,消费绿色金融在实际落地地上仍有许多问题待解决,以购买新能源汽车为例,目前其与普通汽车贷款利率是否应该区分?当前市场上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车险相较于燃油车,甚至更加昂贵。”

一位消费金融公司内部人士表示,目前,消费金融参与主体普遍面临业绩增长和盈利的双重压力,将ESG发展理念融入企业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仍需要将主要重心放在业务本身核心能力的培养上。“对消费金融而言,利率的制定要明确其差异化定价的意义,并非越低越好,现阶段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方向是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量做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统一平衡。”

铜陵学院经济学副教授芮

训媛告诉记者,国内部分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消费端进行了一些产品创新,如中信银行、平安银行碳账户、建设银行碳账户等,在尝试构建公共出行、垃圾分类等绿色消费场景后,国内也有一些在绿色支付、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领域的场景化实践。

“从海外市场来看,建立个人碳信用、碳账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供相应的消费金融激励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模式。但是现阶段,国内碳信用账户体系的牵头问题、统一口径以及对减少个人碳排放量的回馈机制搭建都还处在摸索阶段。”周扬认为,可量化的个人碳排放评价标准与有效激励手段是绿色金融必不可少关键环节。

芮训媛也认为,由于消费端的绿色金融场景存在零星式、离散型的特点,如何将这此个人低碳行为与金融服务之间构建起联系仍是关键问题,数据支持系统的搭建将是重点,做好绿色低碳行为的足迹记录和绿色消费者画像,才能

在此基础上针对绿色消费场景下的消费者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在个人碳账户建立之外,在实务层面,ESG信息披露如何真正产生价值也仍需进一步探讨。

有金融机构从业者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在ESG实务层面存在信息披露标准及评价体系尚未统一规范的问题。“统一的标准对于企业明确自身可执行的路径方向的明确,金融机构对ESG信息使用的有效性以及完善加强ESG能力建设相关的激励和支持机制都十分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屠光绍日前也表示,兼顾信息披露的效率与成本问题将是重要探索方向。在财务信息之外,增加披露ESG信息势必会带来企业成本的上升。因此,增加的披露成本是否能在聚集可持续发展投资与金融资源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应是包含信息披露标准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构建的重点研究方向。

上接 B7

后续,该行计划进一步打通风力发电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氢能产业链等绿色能源重点产业,以“全产业链”覆盖为目标为“双碳”战略贡献金融力量。同时,该行还将积极落实国家和上海市绿色经济的发展战略,加快加大绿色金融步伐,为绿色产业经济输血助力,充分发挥本土银行优势灌溉绿色实体经济的发展。

深圳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则

向记者表示,未来该行将从两方面进行重点投入,一方面是探索更多的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重点支持建筑的节能减排、企业的数字化自动化改造、绿色出行和先进碳减排技术等细分领域,以适配绿色领域的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在行内数字化建设上,以数字化建设提高业务发展效率。

需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推动等背景下,事实上除了农商行之

外,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均在不断提升对绿色金融的重视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农商行的定位差异如何体现?

在业内人士看来,相较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等机构而言,农商行的实力规模、人才等方面会有一定差距,不过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一员,农商行可以选择特定的细分领域建立相对优势。

对此,深圳农商银行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定位上,与城商行主要服务中大型企业的目标有所差异,该行持续专注服务民营和中小微企业,在过往经验基础上,主要为中小微企业开发适配的绿色金融产品。比如,针对深圳地区分布式光伏项目融资门槛高、融资不方便的问题,推出“光伏贷”产品;为深圳地区工业厂房物业和规模较小的新能源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等。

此外,中国化管理协会乡村振兴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帅也告诉记者,农商行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一环就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在袁帅看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不高,已经成为制约做好“三农”工作和推动乡村振兴的痛点、难点。因此,农商行绿色金融的“战场”在乡村振兴,而非城镇。

其表示,农民对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正日益

迫切,现有的金融供给难以满足其实际需要。因此,袁帅建议,农商行在发展绿色金融时,可以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三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同时,也要不断丰富信贷产品种类,满足乡村振兴各领域金融需求;充分利用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和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政策,积极创新信贷产品,将更多低成本金融资源向乡村振兴领域倾斜。